

中国经济反思录（上）

南方出版社

署名：蔡恩新/编著

书号：ISBN 7—2733—4027—X

电子版定价：5.00 元

版本：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CIP 数据核字（2005）第 114462 号

出版社：南方出版社

目 录

第 1 辑 不管白猫黑猫，捉老鼠就是好猫

- 一、回到文革去
- 二、泥腿子的“叛逆”
- 三、贫穷能维系稳定吗
- 四、姓“富”还是姓“穷”
- 五、“左”魂灵的问与答
- 六、民心是一杆称
- 七、资本主义复辟
- 八、鬼子来了
- 九、“左”比右好
- 十、五千年，一句话

第 2 辑 中国商人起步史

- 一、中国商人的历程
- 二、中国老板群体的发展状况
- 三、对中国老板的认识与批判
- 四、希望的田野上
- 五、农民商人进城
- 六、农转非：麻醉人的光环
- 七、“干部”掉价了

- 八、辞官，没听说过
- 九、辞官！入海成龙
- 十、公家靠不住了
- 十一、为自己赚钱：人才大“跳槽”
- 十二、拎着保险绳“下海”
- 十三、文化转型者
- 十四、悲凉之雾：知识分子有多穷
- 十五、天上掉下个知识馅饼
- 十六、倒书成商
- 十七、闯入商界的文化人
- 十八、何苦死撑面子
- 十九、到处都是外地人
- 二十、神州摊贩知多少
- 二十一、老外，中国贩子也不是吃素的

第3辑 特权时代

- 一、权力资本——超经济暴利资本
- 二、价格双轨：“官倒”携款潜逃
- 三、权力的第二次机遇：利率差价
- 四、第三次机遇：巨商争雄房地产
- 五、第四次机遇：权力股票
- 六、第五次机遇：最后的疯狂——蛇吞象

- 七、成就说明了什么
- 八、苍蝇“越打越肥”
- 九、站在“高岗上”
- 十、权力是怎样疯狂的
- 十一、腐败谁之过

第4辑 地下经济在中国

- 一、腹蛇的启示
- 二、地下经济能“肿”多大
- 三、“搞活”地下经济
- 四、“寄生”在光天化日下
- 五、诚实与欺骗“和睦”共处
- 六、“天使”与撒旦结的怪胎：高利贷
- 七、防不胜防的走私狂潮
- 八、新的“鸦片战争”
- 九、令人眼花的毒品暴利
- 十、可以炫惧的罪恶：造假
- 十一、“野鸡”挡道
- 十二、地下经济的“功”罪
- 十三、宠物也疯狂
- 十四、文化掮客，斯文败类

第 1 辑 不管白猫黑猫，捉老鼠就是好猫

据说在十八世纪的埃及，当拿破仑目睹中国劳工的坚韧之时，发出了一句惊世的预言：
那东方的国度是一头睡狮。

可清王朝的中国——穷，这是封建的祸端。

十九世纪，一位游历了大江南北的洋传教士著书说：“这是一片无比肥沃富饶的土地”，
可中国人那时却更贫更穷——这是专制、掠夺的祸端。

当中国推翻了“三座大山”，中国人以“一辈子吃两辈子苦”的坚韧，要摘下一穷二白的帽子，中国人不怕穷！

在“大跃进”的年代，我们设定了“超英赶美”的速成计划，甚至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，每个人可以免费领取多少布都已算好了……可随之而来的是千千万万的“浮肿病”，那时中国人饿死了多少？

在十年“文革”，乞灵于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豪迈地高呼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。当我们在高唱“社会主义好”的赞歌时，却不得不忍受票证的难堪……这些都是“左”的祸端。

“左”祸，误国害民。

我们曾经很天真，我们生活在天堂；我们甚至一度很“狂妄”：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需要我们去解救他们。而且我们也很固执：如果资本主义复辟，劳动人民就要“吃二遍苦，受二茬罪。”

而我们最终得到了什么？

愚昧和贫困。

直到古老的国度打开“开放”之门时，我们恍然大悟了，哦，原来我们正穷着呢。

“中国要发达起来，中国穷了几千年，现在是改革这种状况的时候了。”邓小平说人民渴望富裕，富裕的原则是：不管白猫黑猫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。所以人民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改革的潮流。

中国人的碗里自由了，屋里有了彩电、音响，身上的衣服有了色彩，课堂上有了ABC，文化市场有了摇滚乐，商业领域有了“商战”，荒芜的土地上耸立起了特区，交易所里有了股票……

站在二十世纪的终点，我们并不炫耀中国十八年改革的“辉煌”，因为中国还远不够“发达”；也并不自诩中国人“富了”，因为我们还在向“小康”迈步。但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，至深至切地体会到改革所带来的奇迹。

十八年改革，十八年风雨，“‘左’的根子很深”，“根深蒂固的是‘左’的东西”，“‘左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”《邓小平》。改革开放每走一步，总会有‘左’魂灵横刀拦马，开口闭口“姓资姓社？”每一次“左”的思潮都是一根棍子，把经济向衰败驱赶；都是一副镣铐，紧紧地锁住人们的手脚。

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如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“两个凡是”的否定一样，生产力标准也否定了新的“凡是派”（凡事都要问一问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），让老百姓放心大胆致富赚钱。

泱泱大国，13亿人口，底子这么薄，实在乱不得，乱了，那是真的“天下大乱”。如何才能维系稳定？靠搞政治运动压制吗？那只能把国家搞得更穷更乱，无疑于在社会的延时炸弹里填充更多的“TNT”。

贫穷不能维系稳定。

“民富国强”，人民受惠于改革，人民自然选择改革，拥护改革，支持改革者。

一、回到文革去

几年前，在《新民晚报》上，舒展先生建议，让那些“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家带着他们的哥儿们开辟一个‘回到文革去’的特区。”

在那里，他们尽可以成天发改革开放的牢骚，尽可以过足“大批判”的瘾头。那里的农田，不妨改成“不长资本主义苗”的试验田，看看大家重新用起布票、棉花票、日用品卡是否其乐融融。那里的人民公社、革委会、文工团一律保护“大锅饭”，男女老幼、勤懒智愚统统进入绝对平均和无差别境，从此消灭了“红眼病”。那里的电影是“八个样板戏”，小说是“高大全”，歌曲是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”，标语口号响彻云霄，方海珍们风韵犹存，但人们的思想纯而又纯，阶级斗争仍须年年讲，日日讲，天天讲……

这是一出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国土，让人们把目光回头冷视：不怕不认货，就怕货比货，这句大实话却是再有理不过了。

北京郊区，一位农民小企业主说了这样一段话。他说，如果在过去的十多年里，我们还是按着老路子走，也就是说“按既定方针办”，按“两个凡是办”，“人民公社三面红旗”，八亿农民一律听从支部书记的钟声和哨声来指挥，拨一拨转一转，不拨不转，那社员们辛辛苦苦干一天，工分不到一角钱，干上一年最后有的还要欠工分帐。那时的宣传却称赞是“农村工厂化”，“农民工人化”。“大锅饭”几天之后，把粮食全吃光了。可知道有多少农民饿死吗？

小岗村位于风阳县正东方向，离县城整整 80 华里，三年“自然灾害”时期，小岗饿死 60 人，死绝 6 户，76 人背井离乡去讨饭。1960 年，全村只有 10 户人家，39 个不能乞讨的老弱病残者蜷缩在一间间泥巴草房里。村边的那口死水塘，水干了，村里死的人多，没有人有力气挖坑，就都浮埋在那里……

北京《××报》主编王奇被押送到农村“监督劳动”，后来他回忆道：“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是个穷队，山区土地瘠薄，那几年大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生产大幅度下降，每个劳动日(10分)值才有1角8分2厘3，我每天辛勤劳动只挣8分工。我的全部财产，除了父母给我的身体之外，真是一无所有，我拿什么养活家人呢？当时把偷钱包的叫做“钳(钱)工”，把偷自行车的叫“车工”，把职业卖血者叫做“酱油工”。“家贫不惜宝”，我也只有走上卖血一条路了。100CC二人民币15元——这就是血的价格。

1976年成都街口，有一首署名“黄蜂”的《票证歌》，它是行将完全觉醒的人民群众在长久沉默之后的一声呐喊。“黄蜂”自不是真名，作者叫李唯苏——

“记得(成都)文化宫门口有一张大字报，鼓吹‘文革’是‘世界历史的新纪元’。许多人在上面批了不少小字，多以生活每况愈下为例，斥其荒谬绝伦。造反派又写出大字报，说文革的阵痛是必然结果，将来中国会如何光明，最可笑的是，竟称当时泛滥的票证是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的萌芽。当时我二十多岁，究竟涉世未深，血气方刚，也不管那坐监杀头的危险，回家后写下了《票证歌》：

烟要票，酒要票 / 肉要票，糖要票 / 样样东西
都要票 / 每人发了一百号 / 一号买豆豉 / 二号买粉
条 / 三号买点心 / 四号买花椒 / 五六七八九十号 / 妈
妈记，娃娃抄 / 密密麻麻列成表 / 每月墙头贴一张
/ 家家户户不可少 / 平时票证要锁好 / 每票买啥要
记牢 / 逢年过节票更多 / 美其名曰“皇恩照” / 豆
腐乳，一张票 / 火柴肥皂各一票 / 烟票锅票灯泡票
/ 花生糯米月饼票 / 缝纫机凭工资卷 / 自行车儿票
拈票 / 婴儿才有白糖票 / 产妇才配红糖票 / 粮票要

分粗和细 / 号票也分市和郊 / 这这样票，那样票 / 只

有一票给忘掉 / 年满十八该选举三十还没见选票

/ 美帝反动苏联修 / 只有我们最最好 / 继续革命开

新篇 / 艰苦奋斗要记牢 / 文化革命凯歌奏 / 只管拉

车不吃草。

为避免惹祸，将一张白纸四边剪裁一些，使之看不出原来的开数；笔迹一改自己的习惯，用圆珠笔一笔不苟地写，为了不留‘作案’指纹，还戴了手套。写好之后，像当年亚瑟画牛虻一样，在右下角画了一只黄蜂。

待夜深人静之时，我与 C 君穿上黑大衣，戴上棉帽、口罩和手套，怀揣《票证歌》，颇有几分‘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’的豪气。贴在文化宫为宜，因为这里已成为论战的中心，再说那晚这里停电，真乃天助我也。于是我们将自行车停在有两条街之距的体育场围墙边，没有锁，以便及时逃遁，佯作自外地甫归状，迳往文化宫走去。

见四下无人，由 C 君望风，我迅疾摸出浆糊，倾涂于那张鼓吹‘文革’是历史新纪元的大字报上，随即从怀中掏出《票证歌》胡乱贴上面，然后与 C 君一溜烟遁去。当我们跑到停自行车处时，浑身已是大汗淋漓了。

第二天，文化宫门口人山人海，不知有多少人在抄写。大家在哄笑，在叫绝。我不动声色地看着自己的‘小把戏’竟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，心情该是何等畅快。我故作镇定地走到文化宫一看，墙上贴大字报处，已被挖个方框，《票证歌》被公安局起走了，还拍了照。然而它的影响，即是当局无法扼止的了，它迅速地传播——北京、上海、重庆……到处都有人转抄，而且很多地下刊物，如重庆《新潮》、北京的《四五论坛》，都转载和论及此事。并非《票证歌》怎么样了不起，它只是代表了人民的心声。”“叛逆”的声音，预言着改革的火种在民众心中萌动。

二、泥腿子的“叛逆”

这里是历史的转变处，湘乡县沙田乡大坪村，毛泽东的外婆家。1961年春天，在这里发生了一件震撼整个中国的事情：第一个解散了公共食堂。来了中央调查组，开了一晚上的会。面对饥饿走投无路的农民，壮着胆子说了心里话，后来经中央领导批准，农民终于可以在自家的锅里吃饭了。那是最后的早餐，迎着东方的红日，农民舔净了碗里的饭粒，拿着各自的餐具，回到自家的锅灶旁……

这里是历史的起点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，1978年11月，18户饥肠辘辘的农民，联名签字画押，决定包干到户。他们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——

“我们分田到户，每户户主签字盖章，如以后能干，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，不在(再)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，如不成，我们干部作(坐)牢杀头也干(甘)心，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”。

这份“保证书”写在一张简陋的白纸上，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。

如今，它静静地躺在中国革命博物馆，一动不动，仿佛已经沉睡。透过光洁的玻璃，可以看到18位泥腿子的“保证书”，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先声。

1977年6月，万里赴安徽上任前夕，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抓住万里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安徽就指望你了，硬是要把它搞出成绩来！”

万里苦苦地思索多日，他决计不顾个人荣辱沉浮，要为安徽4500万父老乡亲做一项重大决议。

1978年9月1日，安徽省委召开紧急会议。万里说出了他思考多日的想法：“要全力抗旱，能多收一斤就多收一斤，能多收一两就多收一两。保不住收成，一切都是空话！农民很穷，他们手中无钱，就是国家供应返销粮也买不起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

土撂荒，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。与其撂荒，倒不如借部分土地给农民……”

此言一出，与会同志大为震惊！

就在这时，一股强大的冷风从北京刮来了。

1979年3月1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封名为张浩的读者来信《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，应当稳定》，该文编者按指出：“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的制度”，“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、包产到组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、包产到组的地方，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，坚决纠正错误做法。”

1979年3月16日，也就是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的第二天，安徽省第一书记万里驱车来到滁县地区。

当时滁县地区是大包干到组、联产责任制的发源地，搞得很活跃。万里一下车，就被各级干部和群众围住了。人们群情激愤，纷纷要求省委拿主意。

万里耐心地解释和劝慰说：“同志们不要急，省委支持你们！”

有个县委书记听了，摩拳擦掌地说：“万书记，我们听您的，不动摇了！”

万里点点头，大声说：“对，不能动摇了！一动就乱，生产就要出问题……”

经过一番风雨，安徽全省的农业形势大好，“要吃米，找万里”，万里在肥西县山南区搞的试点产量翻番。更惊人的是小岗。

1979年，小岗粮食总产量14万斤，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，油料作物也喜获丰收，全年共收3万5千斤，相当于小岗从1960年到1978年将近20年的总和。

小岗人彻底告别了靠救济的日子，他们履行了他们的诺言，这一年向国家售粮2万5千斤，山芋干5千斤，油料作物2万5千斤，还第一次偿还了国家贷款……

1980年1月20日，上午8点40分，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出现在小岗的土地上。

万里握着一双双粗糙的手、劳动的手、曾经讨过饭的手，大声说：“同志们好啊！……”

小岗之行，给万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万里专门打电话给邓小平汇报。邓小平那时已实际上主持了中央工作。当小岗村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巨人邓小平耳边响起时，无比敏锐的他马上有了兴致，说：“农民自发搞起来了，这是大势所趋呀……”

到 1981 年 6 月，全国农村农民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已占总数的 87%，沉睡的中国农村苏醒了。

为推动农村改革的顺利进行，1982 年元旦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把农村工作放在首位的中央 1 号文件出台了，它明确指出：“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，联产到劳，包产到户、到组，包干到户、到组，等等，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。”毫不含糊地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正了名，为几年来无休无止的大争论划上了句号。

这也许是一个悖论：当年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时，农民一呼百应喜气洋洋，可一旦把他门绑在“人民公社”的绳索下，要他们狠斗“私”字一闪念，却蔫了，宁肯大家穷也愿意出工不出力，落个挨饿讨饭的苦果。但“包干到户”，让农民为“自己”种粮，却朝气蓬勃。这让某些“左”先生很是丧气：三十年的“斗私批修”，却抵不过一个“单干”。

何必挖苦人是“自私的动物”，在农村的家庭承包制，“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，在城市允许个体、私营企业“赚钱”，目的就是“解放生产力”，以达到“民富国强”。

三、贫穷能维系稳定吗

受“左”的伤害最深、最早尝到改革甜头的农民，最有发言权：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，能有今天的安定团结吗？农民为了不饿死找饭吃起来闹事，是什么力量也抵挡不

了的！

一位××市的副市长，1992年曾到广东和深圳特区参观，回京后他对我说了一段值得深思的话。他说广东的宝安县与香港数海里相隔，在1978年之前，为了阻截农民向外逃跑，把全县的军队公安都摆在接壤的边境上，但是农民还是冒死外逃，军警铁丝网还有大海，都挡不住农民向资本主义世界的香港外逃。

仅仅在十年后的今天，好像奇迹自天而降，外逃的农民不仅返回了家乡，各村的“逃港户”的耻辱门牌也都不见了，而且有些“老香港”看到我们这边现代化城市（指深圳、珠海）拔地而起，特别看到农民们的新居楼房，连绵错落在渔塘田禾间，他们羡慕极了，有的还申请重返老家落户。

有一位驻深圳的记者说了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：在1989年六·四风波期间，南方的特区平静无事，反而冷眼看北京。据说，有一位农民对学生说，你们上街闹事，这是你们的事，可别想要我们跟你们去。你们游行时要喊邓小平万岁的口号，每喊一句，我给一百元钱，我用计算机给你计算，最后全部付清，概不欠账。因为我们这里的农民都沾了邓小平的光，都富起来了，我现在很有钱了，还盖了新楼房……

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。趣意之中又蕴含着一个严肃的真理：只有富裕才能使人思安定。

“民富国安”，祖宗创造的这个成语，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社会辩证法。生也者，人类之大道也（中国古代哲言），老百姓穷得没法活，就逼得要造反：社会财富贫乏，一部分人多占有就会威胁着另一部分人的生存，阶级斗争就会异常尖锐，天下就不得太平。中国历代农民起义，多发生在哀鸿遍野的饥荒年间，最穷的地区往往就是革命的根据地——井冈山、川陕地带……

再环顾周围，大体如此。

越是贫穷的国家、地区，越是容易出现动乱、政变，领导人换得像走马灯似的。而在经济发达的国家，政府对社会风波承受力增了，对待街头示威司空见惯，应付自如，并不大惊小怪。

稳定压倒一切。这句话本没有错。泱泱大国，13 亿人口，底子又这么薄，实在乱不得。乱了，那就是真正的“天下大乱”。

但问题在于，如何才能维系社会稳定。

靠搞政治运动压制吗？“文革”的浩劫证明，那只能把国家搞得更穷更乱，无异于在社会的延时炸弹里填充更多的“TNT”。

贫穷不可能维系稳定。

那么，摆脱贫困靠什么？

在正常的情况下，当然是靠努力薄赋敛，休生息。但当生产力束缚和摧残的时候，这就要靠社会变革。

变革，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。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，就是一部变革史。变革是历史的必然，但变革也可能会带来暂时的社会震荡。在一定的历史情况下，我们只有承受住这种社会震荡，如果因怕震荡而抱残守缺，把矛盾推向身后，那么，等待着的必然是更大的震荡和激变。

东欧巨变、苏联解体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哗啦啦倒下一大片。论其原因，你可以说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，也可以归结为他们政治手腕太软了，还可以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……但这一系列因素之所以能起作用，最根本的一点是经济改革搞晚了，经济垮了。苏联社会主义搞了 70 年，搞得柜台里没有商品，物价飞涨，再美好的主义，老百姓也不会巴心巴肝地拥护，解体就解体，不少人接受了。难怪有人说，苏联是“安乐死”。

四、姓“富”还是姓“穷”

姓之用大矣。指斥一个人晕头转向，说他“不知道姓什么了”，就如形容一个人糊涂颠预为“做官把印丢了”一样。阿Q自称跟赵太爷是 본家，招来一记耳光，“你怎么配姓赵——你哪里配姓赵？”

1991年，中国的一些著名报纸和刊物，相当集中地连续发表文章，讨论“问一问姓资姓社”的问题：

——“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，曾有过一个时髦的口号，叫做不问姓‘社’姓‘资’。结果呢？在不问姓‘社’姓‘资’的掩护下，有人确定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。”

——“改革不问‘姓社姓资’，其前途是危险的。”“问问姓‘社’还是姓‘资’，”作为一种修辞方式，似是几十年“天下穷人是一家”这一宣传的继承和发展，大家都“姓共”、“姓农”、“姓穷”，这曾经是发动贫苦农民同仇敌忾的有力口号。

人们不会忘记，在以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文革岁月里，也问过姓资姓社。那时的经典答案便是：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。先给“草”赐了一个“社会主义”的封号，然而论证：“草”姓“社”，虽然是“草”，我们还是要的；因为苗姓“资”，尽管是“苗”，我们也不要——豪迈的语言，顽强的愚蠢。

然而现在已不是依靠雇农打土豪分田地或进行土改的时期，也不是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合营改造时期了，尤其不是“左”祸猖獗的文革浩劫时期了。中国人民从切身的痛苦经验中，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摆脱贫穷落后的道路，那种所谓“苗”、“草”的违情悖理之论，已被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所代替了。

如果一定要问姓的话，还是多问问中国到底要姓“富”还是要姓“穷呢”。

五、“左”魂灵的问与答

国际饭店楼顶闪亮外商的广告，“姓资姓社”？

让外国商人在我们的国土上，居高临下，耀武扬威，同旧上海有何区别？“姓资”。

虹桥开发区向外商批租土地，“姓资姓社”？

不要忘记旧上海的“租界”！现在还搞“租让”？“姓资”！典型的卖国主义和投降主义。

那么，搞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，造就“社会主义香港”、“开发浦东”，姓什么呢？

有的文章说，改革开放问“姓社姓资”，是“不问不知道，问过见分晓。”事实上，改革开放一开始，就不断地在“问”，也不断的在“答”。

十几年的历史，不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。只不过“左”魂灵们，屡“问”屡“答”，屡答屡错。

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。农村最大的改革便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或叫包产到户。包产到户姓社姓资？问过吗不是不问，而是不敢问。虽然不敢问，答案却十分响亮，这是走单干的道路！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！姓资！

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、生气勃勃。答案是：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，是对社会主义的威胁。“姓资！”

搞厂长负责制，“姓资姓社”？答案是：这是削弱党的领导，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。“姓资”！

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——这是私有制潜行，会改变在社会主义性质。“姓资”！

引进外资，“姓资姓社”？答案是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，“三资”企业多了，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，就是发展资本主义。“姓资”！

划出一块土地给外商承包开发，“姓资姓社”？答案是：这是出卖国家主权，丧权辱国。

这就不仅是“姓资”的问题，简直就是“卖国贼”，“姓贼”啦！